

99岁老红军余新元

讲故事的老兵有故事

“采访我?采访什么?”在辽宁省军区鞍山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里,99岁老红军余新元问道。

“听您讲故事!”记者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余新元会讲故事出了名。几十年来,他讲了许多许多故事——白求恩的故事,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,雷锋的故事……以前,他到全国各地去讲,辽宁、湖北、上海,行程几万公里;年岁渐老,他在自己家里讲,党政机关、学校、社会组织,来听故事的人络绎不绝。

余新元讲的故事,都是他的亲身经历,亲眼见证。这些年,在他的讲述中,主角总是别人,他只是“一片绿叶”。

今天,让我们调整聚光灯的角度,照在“讲故事的人”身上,一起去品读老红军余新元自己的故事。

一个战士与白求恩的故事

“要向前冲,决不后退”

“别说了,难受……”

余新元讲白求恩的故事,常常只有开头,没有结尾。

1939年,入伍3年的余新元在黄土岭战斗中负伤,“腿上的肉被炸得翻开了,骨头也炸裂了。”

战地医护人员准备为他截肢时,在前线巡诊的白求恩经过他的床前。听说余新元当时只有16岁,白求恩决定亲自操刀,尽力为他保住左腿。

“先将烂肉一剪下,再用捣碎的大蒜给伤口消毒。”余新元清楚记得,白求恩将消毒用的纱布从他的左腿里侧一直插到外侧,再细心地涂药、包扎。

余新元的伤慢慢好起来,白求恩却永远离开了。那次巡诊中,白求恩在抢救其他伤员时不慎感染,患上败血症。为余新元做完手术的5天,他光荣牺牲。

重新站起来的余新元,一生感念白求恩的恩情。回到战场上,他时常想起白求恩刚到前线时对大家说过的话: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,要向前冲,决不后退!”

“决不后退”,就是死也不退。

1941年,日军集中5000余兵力,对晋察冀边区狼牙山地区疯狂扫荡。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某连副连长的余新元,奉命带领4名战士阻击敌人,为团主力和群众转移争取时间。

5个人、15发子弹、47枚手榴弹,这

讲述

仗怎么打?余新元组织大家利用有利地形展开阻击,手榴弹、“石头炮弹”全面开花,连续打退敌人19次进攻。当敌人发起第20次进攻时,他们已精疲力竭。

战士张祥多处负伤。弥留之际,他与余新元留下这样的对话——

“副排长,我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?”

“我现在就介绍你加入!”

“清明节,能不能替我到父亲和哥哥的坟前上根香,添把土?”

“只要我活着,我替你去!”

张祥牺牲后,余新元带着战士们继续战斗。战士们接连倒下,最后只剩下余新元一人。

直至胸部被子弹射穿后失去意识,余新元也没有后退一步。

“张连弟,袁庚辰……”余新元讲述的故事中,牺牲的战友大多有名有姓。时隔几十年,那一个个鲜活的形象,仍深深刻在他的心中。

2015年9月3日,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,余新元身穿灰色军装,乘车从天安门前经过。镜头中,他的军礼庄重,目光坚毅。

“我是代表牺牲的先烈经过天安门的,不代表我自己。”余新元说。

一位政委与雷锋的故事

“我永远是雷锋的学生”

余新元家听他讲雷锋故事的人,离开时会带走一件“小礼物”——余新元自己设计定制的徽章。徽章中心是雷锋的照片,周围一圈写着“学习雷锋从我做起,红军战士余新元赠”。

宣讲雷锋故事,弘扬雷锋精神这些年,余新元已送出数万枚这样的徽章。徽章上的雷锋,仍是20岁出头的模样。看照片的人,已走过半个多世纪。

1959年,一名叫雷锋的年轻人,在时任辽宁省辽阳市兵役局政委余新元家中,住了近2个月。一心想参军的雷锋,因为体检不达标没征上兵,就到兵役局去帮忙,什么活都抢着干。得知雷锋的苦难经历后,余新元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根正苗红、思想上进的青年。他不仅让雷锋住在自己家中,后来又推荐他去当兵,亲自把他送上运兵的火车。

1962年8月,雷锋牺牲的消息传来。拿雷锋“当儿子般疼爱”的余新元悲痛不已,把挂在家中的雷锋照片摘下来,

紧紧拥在怀里。他泪流满面地对妻子说:“雷锋就是咱的儿。他没走完的路咱要接着干,他没走完的路咱要接着走!”

此后,余新元把学雷锋、做雷锋融入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离休后,他更是把宣讲雷锋精神作为晚年最重要的事。

30多年来,余新元拖着截去前脚掌的右腿,累计宣讲4000余次。有一次,他到一所山区小学作报告。道路崎岖行车不便,他不顾身体情况徒步前往,还没走到一半,假肢接口处就磨得右小腿生疼。当他终于挪进教室时,脚已被鲜血浸透。一名前来听课的老师说,那堂课,未开讲,已感人。

“我号召大家学雷锋,首先自己要做雷锋。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怕苦畏难,这样我讲起雷锋的故事才有说服力。”余新元说。

鞍山市出租车行业雷锋车队首任队长李庆良告诉记者,2006年,当地一些出租车司机想成立雷锋车队,又怕做不好砸了牌子。李庆良向余新元请教,老人的回答朴实又真诚——“车轮一动,想到群众”。

“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。只要我们学他、做他,做他、学他,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”余新元说,“我现在的雷锋的学



余新元为辽宁鞍山雷锋车队出租车司机讲战斗故事。

余新元佩戴自己设计的“雷锋徽章”,讲述雷锋故事。

余新元为干部所工作人员宣讲革命传统。

生,永远是雷锋的学生。”

一名小伤员与王妈妈的故事

“参军、入党,是爷爷定的家规”

余新元的二女儿余锦玲记得,有一年过年,菜刚摆上桌,父亲就开始向长辈们“提问”。

“我问你们,现在的生活幸福不幸福?”

“幸福!”余新元的孙子余晓抢着回答,“是您跟战友们浴血奋战打下了红色江山,才有了今天的幸福。”

余新元讲述的故事里,“幸福”是经常出现的词汇。

1941年的狼牙山反扫荡战斗中,胸部中弹昏迷的余新元被救起后,在老手王义珍家的炕头一躺就是大半年。王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,让年少丧母、出身贫苦的余新元,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幸福。

“有一口好吃的,她都要留给我。”余新元说,为了给他补充营养,王妈妈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,只为换回大米熬粥喂给他吃。

“一不沾亲二不带故,人家凭啥救你?因为老百姓把我们当亲人!”余新

元常常教育子孙,只有跟着党走,努力为人民谋幸福,才能回报“王妈妈们的恩情”。

那一年,余新元的大儿子余锦光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,想让余新元帮助找份好工作。余新元一口回绝:“我是党的人,你是红军的后代,你得当兵去。”

“温室里养不好花草,要经风雨、见世面,才能有前途。”余新元先后把5名子女全部送到部队历练。

“参军、入党,是爷爷定的家规。”余晓说。在余新元心中,儿孙参军入党、报效国家,是为了更多人的“幸福”。

2018年,余晓响应号召,来到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雅河乡双泉村,成为驻村“第一书记”。听说孙子下派驻村,余新元很高兴,写信勉励余晓:“脱贫致富也是战场,驻村书记是冲锋在前的兵。”

2021年7月1日,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。余新元端坐在电视机前,全程收看大会直播。听到“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”的庄严宣告,余新元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办成这么伟大的事情!”

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文/王钰 祝福昌)

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宫,曾是清代的高等学府。这里环境幽雅,古香古色,郁郁葱葱。1926年5月至9月,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那里举办,为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、推动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招生条件十分严格

1924年1月,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,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。鉴于唤起更多农民投身国民革命的形势需要,在国民党任职的共产党人彭湃,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(以下简称农讲所),将此作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。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,共产党人以“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”为宗旨,连续开办了六届农讲所。彭湃、罗绮园、阮啸仙、谭植棠、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。来自全国近800名学员,在此学习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,进行军事训练。

农讲所曾三易地址,第一、二届农讲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举办,第三至第五届农讲所在东皋大道1号举办。由于第六届农讲所是招生规模最大的一届,举办地迁至占地宽广的番禺学宫。文献记载,农讲所的官方名称是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”,尽管被冠以国民党的头衔,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领导,历届所长也皆为共产党人,教员也多属共产党员。

农讲所招生条件十分严格,学员大多来自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。招生方首先要审定学员资格,对个人基本情况、社会关系、政治履历和革命态度,以及从事农民运动的能力进行全面考察,随后再进行口试和笔试,最终选取军政素质高、具备担任农民运动干部潜力的应试者入学。

学员们农讲所过着俭朴、严肃、活泼的生活。农讲所规定,每晚7时以后进行自修,9时休息,清晨5时起床,若无特殊情况,所有人在晚9时以后一律不得离开寝室。学习的课程,主要是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及革命理论。例如,彭湃就把农民运动作为一门主要课程,将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,传授给学员;阮啸仙讲授《如何开展农民运动》《广东农民运动状况》,给学员指出从事农民运动的必要途径。此外,教员还组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讨论。

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——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

实行准军事化管理

农讲所的另一个特点,就是实行准军事化管理,专门设有军事训练部,负责对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。根据各届人数,学员按军事编制编为总队、中队、区队、小队、分队或连、排、班等。第一届招生人数最少,仅编为1个中队;第三届人数稍多,编为1个连,下属2个排,每个排编有3个班,每个班13至15人;第六届人数最多,编为1个总队,下设2个中队、6个区队。学习安排上,第一届共进行1个月,军训时间为10天;第二届军事训练约20天;第四届采取上午军事训练,下午授课的方式;第六届的军训时间更长,占全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。学员每人配备步枪、军装、草鞋、绑腿、挎包等。日常除学习军事理论外,学员们还进行战术训练。

1926年5月至9月,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,共有来自20多个省区的327名学员参加农讲所培训,周恩来、彭湃、恽代英、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任教员。第六届农讲所课程多达25门,内容涵盖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、中外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等。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,在负责主持教学工作之外,还亲自讲授《中国农民问题》《农村教育》《地理》3门课程,还让每名学员写一篇当地人民受残酷压榨和剥削的真实故事,写好后先在农讲所讲读,再选取最典型、最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编辑成册,发给学员阅读。毛泽东强调,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,深入开展农村调查。他带领学员奔赴农村实习,并将全体学员按地区组成了13个“农民问题研究会”,列出租界、田赋、主佃关系、抗粮情形等36个项目,深入调查,使全场掌声雷动,工友们高喊“解放军万岁”“支援前线”等口号。解放军亦以“职工万岁”“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回答,充分表现了军工一家的融洽感情。

在联欢之余,战士们还耐心答复人们关于解放军生活的疑问。前国民党上海被服总厂的工人向解放军津贴这么多够花吗?战士答道:“人民供给了我们全部吃的穿的,我们还要许多钱干什么?我们出来不是图升官发财,这津贴也是人民发给我们的,我们多赚了,人民的负担就重了。”工友们纷纷表示解放军处处为老百姓打算,而且行动一致、纪律严明,自他们来后,工人们想通了不少问题,精神上也更加愉快了。

在与工友们的联合中,江南造船厂、毛织厂工人保卫工厂、拒不屈露党的秘密等与反动派英勇斗争的事迹,也教育了解放军。指战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,淞沪第一警备区战士陈子路说:“我过去不大愿意做警卫工作,今天才更深刻知道警卫工作是为了人民和阶级兄弟的利益,为了建设大上海、建设新中国!”

这场为庆祝上海解放后第一个建军节而开展的农民运动,也是上海人民为解放全中国、建设新上海而自发举行的支前运动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文/王萌 王传)

(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文/郑大社)

党的光辉照我心

——歌曲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创作传唱的故事
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,母亲只生了我的身,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

几十年来,歌曲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激荡了几代人的心扉。它的歌词质朴感人,旋律优美,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深情,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经典歌曲和难忘旋律。

195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,在那如豆的煤油灯下,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5岁青年矿工姚筱舟写下小诗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当时,他未曾想到,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,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心声。

姚筱舟参加过志愿军,曾亲眼见到一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。他后来转业到煤矿,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,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

激。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。那天深夜,姚筱舟一口气写下3段小诗: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;母亲只能生我身,党的光辉照我心。”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,母亲只会泪淋淋;党号召我们闹革命,夺过鞭子揍敌人!”“母亲给我一颗心,暴风雨中一孤萍;亿万红心跟着党,乘风破浪齐跃进。”

随后,他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“蕉萍”为笔名,把诗投寄到《陕西文艺》。很快,诗被发表了。后来,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《新民歌三百首》。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,看到此诗,非常喜欢,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,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他在摘抄时,还对原诗做了“点石成金”的修改:删掉了原诗中后4句,把“母亲只能生我身”改成“母亲只生了我的身”,将“党号召我们闹革命”改为

“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”。这使这首诗主题更加鲜明,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、更适合谱曲。

雷锋因公殉职后,全国人民掀起学雷锋热潮。1963年,《前进报》摘录发表《雷锋日记》,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,引起音乐家朱践耳的注意。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,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,以便传唱。

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,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,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,采用山歌风格,A-B-A曲式结构,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,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。

作曲家的创作,往往寄托了其内心蕴蓄的情感。战争年代里,朱践耳曾加入苏中军区前线剧团,还组织了华东区文工团任队长与指挥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被送往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在

党的关怀下,他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音乐大师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,倾注着他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这首歌的首唱者,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。1963年早春,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7000人参加的学雷锋动员大会。就在大会开始前的20分钟,上海歌剧院领导交给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,要她立即学会并在大会上献唱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她接过歌谱,轻声哼唱了几遍,一转身就登台了: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……”歌声刚落,现场便响起春雷炸响般热烈的掌声。

巧的是,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。她15岁便加入我军军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,在抗美援朝烽火燃烧的坑道里,她舍生忘死,为最可爱的人歌唱。1956年,她调入上海歌剧院,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可以说,任

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建军节

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,解放军严格遵守“八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”,不入民宅、买卖公平,十万大军秋毫无犯。这些壮举深深触动了上海百姓,迅速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。两个月后,上海即将迎来解放后的第一个建军节。各界人士为表达对解放军的衷心爱戴,自发组织捐款捐物、义卖、义演等活动,各尽所能,用实际行动支持人民军队。

工人阶级: 劳军情绪热烈

1949年7月16日上午,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成立并发表《慰劳人民解放军宣言》,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。工人们在上海解放后就想开展劳军运动,但当时解放军将群众的慰问品都一一婉拒。解放军严格的纪律,更加深了工人们的钦佩和敬仰。八一即将到来,大家劳军的热情再次被点燃。

万利电机厂有职工代表发出倡议:“万利电机厂的职工,一向具有高度的革命热忱,这一次我们要清偿差不多两个月来闷在心底的劳军夙愿……”正

在吃午饭的工友们听到后,不约而同地放下碗筷,飞也似地涌进会计室,争先恐后地捐款。有的工友捐出给产后妻子买滋补品的钱;有的工友虽已欠债,但仍捐出仅有的一点现金;还有的工友并不在厂内,得知消息后急忙打来电话要求捐款,生怕失去劳军的机会。

见此情景,该厂经理郑有荣感动地说:“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前夕,反动派还在‘劳军视捷’,以掩饰他们的败绩,许多伪官不断广播,本厂的收音机都不开,大家连听也不高兴听。现在我们的劳军情绪这样热烈,这是一个‘爱’与‘恨’的鲜明对照啊!”

申新九厂将65万元工人捐款购买了10打跑鞋、20打热水瓶、24打日记簿、24打铅笔、200支牙刷、600件背心、200余条短裤与若干钢笔墨水,连同厂方购买的16打毛巾、190余条香烟和洋火饼干等物资一起捐献给解放军。

上海各厂的工人同志积极捐款,支援军队。为组织好劳军运动,总工会成立了五个区办事处,每区设宣教、总务、会计、稽核、联络五个部门,负责与总

工会联系,开展工作。仅7月17日、18日两天时间,沪西区职工界就已捐款111万元。该区还收到各种慰问品,堆满了一个大屋子。

学生与文体界: 义演义卖踊跃慰军

上海市学联于7月17日召开会议,指出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意义,要求各大学把劳军运动与暑期工作相结合,深入发动大学生参与劳军。

此举得到沪上各大学生的热烈响应。8月1日,东吴大学的同学们除在校内开展捐献活动外,还组织了30人的“擦皮鞋义卖队”,在北四川路青年报社门口进行擦皮鞋义卖,并将所赚款项捐献给解放军。

少先队、儿童剧团等单位的800余名小朋友在育才中学举行“少年劳军联欢大会”,慰劳三野某连的解放军。这些新上海的小主人亲热地给解放军佩花、送慰劳信、擦汗,还准备了15面锦旗、100份《新少年报》送给解放军大哥。

建军节前夕,文艺界的演员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于人民广播电台,以从未有

的兴奋热情,通过声音和电波献出自己的技艺,如短剧、京剧、朗诵、杂艺等。上海的著名演员和明星,如魏鹤龄、黄宗英、上官云珠、秦怡等人悉数出演。每日演出结束后,电台都能收到各方听众打来请求捐赠的电话。

八一当天文艺界的广播演出达到最高潮,上海著名的影剧演员和音乐家们精彩演绎了一天的精彩节目,没有一分钟间断。上海市民打来捐款电话400多次,当时初步统计,捐款达人民币200多万元,捐赠汽车一部,面粉20多袋,及大米、银元、美金等甚多。

青年界劳军分会体育演出组也多次举行劳军义赛,体育界运动名将及各体育团体登记参加者极为踊跃。义赛包括乒乓球、健美表演、国术、羽毛球、游泳等项目。

军工之间: 鱼水情深一家亲

在建军节前后,解放军战士深入群众,到工厂、船厂与工人、海员进行交流。在与中纺总公司联欢时,某营战斗英雄的